

金刻大藏經和磧砂藏的比較研究

智銘

並由時政七足以成其大業也。始不以爲子如百齡之子，則固無以成其事。故其後之子如百齡之子，則固無以成其事。

版大藏經板木全部掠奪而去，致使該批板木行方不明，北宋勅版大藏經就此絕版。

近來已不止一次先後聽到有些大德們不約而同地說：「崔法珍尼師斷臂募刻磧砂藏。」法珍尼師確曾斷臂募化雕造了一部大藏經，但她所雕造的是金刻大藏經，所謂「斷臂募刻磧砂藏」實係訛傳。最近讀到日本龍谷大學專門研究大藏經的小川貫太教授所撰「大藏經之成立及其變遷」一書中，也有上語的記載，可見這一訛誤不但流傳於中國佛教界，日本亦有同樣的誤傳，為要解除這一訛誤，只有將金刻大藏經與磧砂藏雕造的簡要經過，作一

二、金刻大藏經之雕造

中國之有雕板大藏經，最初者應爲北宋勅版大藏經，宋太祖於開寶四年（西元九七一）派遣高品張從信到益州（成都）雕造大藏經印板。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張從信將雕造完成之經板運京（東京開封府）進上，太宗乃命於太平興國寺之譯經院西側創建「印經院」，將二院合稱之爲「傳法院」，開始印經活動，該版大藏經不但頒賜國內各大寺院，甚至鄰近信仰佛教的國家如高麗、日本等，亦獲賜贈。至神宗熙寧四年（西一〇七一）三月十九日，因王安石的新黨變法，國庫財政窮困，爲改革財政，而下旨廢止印經院。所有經板乃於同年八月十日移轉開封府下崇化坊顯聖寺之聖壽禪院接管，由住持智悟大師懷謹繼續印經活動。

大定十八年（西一一七八）潞州之崔法珍，將新雕之印本大藏經一藏，進獻給金國朝庭，旋在燕京聖安寺登壇受戒成爲比丘尼。此新雕藏經之板木，不久移至燕京之弘法寺接管，大定二十九年（西一一八九），在此繼續開始印經活動。法珍尼師在大定二十三年時，曾被金朝賜與紫衣及「宏教大師」之尊號。可能就是因爲其發心雕造並進獻此版大藏經之功蹟有以致之吧！其後趙諷在明昌四年（西一一九三），在燕京弘法寺會建有「崔法珍比丘尼碑」，碑上即有以上諸事之記述。

燕京弘法寺金刻大藏經，傳存至元朝時代，至元二十二年（西一二八五），印有七千一百八十二卷經典。湛然居士耶律楚材，書就「補雕大藏經板疏」，請元朝准予補雕，以便作爲元朝首都之欽定大藏經版，繼續印經活動。

此版大藏經於民國二十三年（西一九三四），在山西省趙城縣之霍山廣勝寺彌勒殿內被發現，在所有佛教文獻中，尚不知有此版大藏經記載的學術界，乃成爲一時甚爲閩動之事件。民國二十四年，上海曾影印刊行了「宋藏遺珍」一百二十冊、十二函公

燕京弘法寺金刻大藏經，傳存至元朝時代，至元二十二年（西一二八五），印有七千一百八十二卷經典。湛然居士耶律楚材，書就「補雕大藏經板疏」，請元朝准予補雕，以便作爲元朝首都之欽定大藏經版，繼續印經活動。

開流通。

三、磧砂藏之雕造

所謂「磧砂」，乃南宋平江府城東陳湖中之洲名，寂堂師元由華亭來此。此洲原爲費氏所有，寂堂師元於乾道八年（西一一七二）在此建一草菴，成爲開拓農民佛教信仰之中心，師元示寂後，其徒建舍利塔，獲頒「延聖禪院」之匾額一方，此磧砂延聖禪院，在南宋中期，即於院北建立經坊，計劃雕印大藏經，此藏即爲崔法珍「斷臂募刻」之誤傳，此磧砂藏之願主爲誰，以及其起源爲何，均不甚詳。在理宗紹定五年（西一二三二）之際，有宋室一族之趙安國，成爲此藏之勸緣大檀越，由僧俗多人擔任募緣工作，派遣至浙江各地開始募集善資，趙安國本人自力出版了大般若經六百卷、摩訶般若經三十卷，紹定四年（西一二三一）七月之大寶積經刊記中有此記載，故此藏可能即在此期間着手刊印。

由磧砂藏之尾跋看，本藏刊行之次第，事先毫無通盤計劃，募有多少善資，即出版多少經典。在端平元年（西一二三四）時，已雕造有「平江府磧砂延聖禪院新雕大藏經、律、論等目錄」二卷，此乃根據湖州思溪之圓覺禪院之目錄雕造者。至嘉熙、淳祐年間，出版甚多經典，然而寶祐六年，延聖禪院爲火災所毀，爲復興禪院，刻經事業因而衰敗，未其完成，南宋亦亡。

至元代時，因該禪院第六任住持維吉之奔走，堂宇伽藍業已復興，於大德三年（西一二九九）之際，設置大藏經局，設定功德主、對經、點樣、管局、提調等職制，繼續進行自南宋以來之追雕事業。大德九年（西一二九九）九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之朱文清一族，喜捨大藏經一千卷之善資。翌年，前松江府僧錄之廣福大師管主八，行宣政院之委，提調雕造大藏經板，並由朝庭予以絕大援助，故不出一年，未雕之一千數百卷，乃予雕造完竣而行出版。此即爲磧砂藏雕印之經過。

看了以上二藏雕造之經過，金刻大藏經是在中國北方之山西，而磧砂藏則在中國南方之浙江，二者相隔數千里，何以有「崔法珍尼斷臂募刻磧砂藏」之誤傳發生，實在耐人尋思，勉強言之，可能爲下列兩個原因所造成：

（一）金刻大藏經與磧砂藏雕造問世之時間大致相同：金刻大藏經是崔法珍在欽宗靖康元年（西一一二六）金兵掠奪北宋勅版藏經之板木後三十年（西一一五六）發願募刻者，到元之至元二十二年（西一二八五年），湛然居士予以補刻。而磧砂藏之發起，亦在南宋中期中建立經坊，到理宗紹定五年（西一二三二）趙安國即捐印了大般若經等傳世，前後相距僅五十三年。可以說，這兩大部藏經，是在同時印造流傳，此可能被訛誤的原因之一。

（二）金刻大藏經與磧砂藏同爲民間募財雕造者：在此二版大藏經問世以前的大藏經雕造，是奉皇帝勅命，由國庫負擔經費，具有無上權威。而此二版則全由民間發起，同時由民間財力而進行者。遺憾的是；磧砂藏之最初發起的原因爲何？其願主爲誰？均不可考，雕造之先毫無計劃，捐多少錢，即雕造多少經板，中途更因火災而中輟，困難重重。而金刻大藏經又不知是何原因，在中國佛教歷史文獻上，沒有佔其一席地位，久而久之，竟被人遺忘。可是崔法珍比丘尼斷臂募刻大藏經的故事，却一直流傳了下來，既然金刻大藏經被淹沒無聞，而磧砂藏又找不到願主，於是從很自然地被認爲崔法珍斷臂募刻磧砂藏，以訛傳訛，由古而至今，由中國而日本，被公認了下來。

以上造成誤傳的兩個原因，完全是筆者於研究該二版藏之後的推測，並無史實根據，是否正確，聊作爲讀者參考。不過；崔法珍比丘尼斷臂雕造了金刻大藏經，是依據小川貫太教授的考證，並經過日本六個大學佛學教授瓜生津隆雄等六人之審定，其考證應有相當的可靠性。但世間事無百分之百的絕對性，也許有百分之零點幾的或然率，如有那位大德能提出崔法珍比丘尼斷臂募刻的是磧砂藏的確實史料，將小川氏的考證推翻，那將是功德無量的事。